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5.007

《小号》中的叙事认同与爵士乐身份

王卉

(大连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从身份构建的视角看杰琪·凯的小说《小号》,其主人公乔斯·穆迪是一位多种族和跨性别的爵士音乐家。穆迪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传记家斯通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叙事认同的方式在穆迪的传记中将其定义为荒淫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有悖伦理的身份界定对穆迪的家人造成严重的困扰。所幸穆迪以杂合性质的爵士乐为隐喻,为自己构建出流动的化身身份;并且想象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谱系,将这种身份构建方式传递给其养子科尔曼。因此,《小号》是作者杰琪·凯于文化和社会规约以外进行身份构建的尝试和探索。

关键词:杰琪·凯;《小号》;叙事认同;身份构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046-07

当代英国小说家杰琪·凯(Jackie Kay)的首部小说《小号》(*Trumpet*)出版后随即获得年度《英国卫报》小说奖和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候选提名,小说也成为西方著名的性别解放文本。《小号》的创作灵感来自爵士乐钢琴家比利·提普顿(Billy Tipton)的生平,提普顿是20世纪初出生在美国的一位女孩,却终生做男士装扮。杰琪·凯以此为蓝本,构想出名为乔斯·穆迪的苏格兰黑人小号手。虽然比利·提普顿生平对该部作品的影响清晰可见,但是《小号》与杰琪·凯其他作品之间的互文关系也是无法忽视的,她在多部作品中都将家族谱系的重构作为对抗恶劣生存环境的心理策略。艾莉森·拉姆斯登(Alison Lumsden)认为,《小号》与作者的剧作《两倍》(*Twice Over* 1989)极其相近,而彼时提普顿的死亡还没有引发公众的关注,自然也没有成为杰琪·凯创作的灵感^①。《两倍》的主人公科拉死后的灵魂仍然盘旋在她与家人和朋友曾经居住的地方,并且帮助他们摒弃所有偏见而构建她真实的人生。而《小号》的读者自然会在经历同样过程后构建起乔斯·穆迪的人生,小说中爵士乐在统领文化线索的同时也成为颠覆传统身份和对抗叙事认同的有

效工具。詹妮特·金(Jeanette King)认为,爵士乐就其定义来说是需要即兴创作的,需要丢弃乐谱和先例,需要有在现有曲调中推陈出新的能力,而非按部就班地沿用既定的角色和形式^②;而爵士乐的特点刚好契合故事中穆迪的身份构建过程。

一 《小号》中的叙事认同

(一)穆迪的传记身份

《小号》中穆迪男性身份所掩盖的女性躯体是故事中讨论的焦点,公众在他死后对此惊天秘密既感到震惊和厌恶,同时也因为好奇而想探究其中细节。人们对穆迪生平的关注为他的身份构建提供契机,也促使他传记身份的诞生。穆迪本身未曾出现在小说中,他的存在是通过作品中多元化的声音而重构的。而心理学研究则认为任何体验只有通过语言的构建才变得有意义,个体是通过话语来构建自我的。产生于此基础的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概念认为,个体通过叙事来整合、内化他们的生活经历,从而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和发展自我故事。叙事认同在重构过去的基础上想象未来,从而赋予个体生命以目标、意义和统

收稿日期:2020-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WW063)

作者简介:王卉(1975—),女,辽宁大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当代英国小说研究。

^①Lumsden, Alison. "Jackie Kay's Poetry and Prose: Constructing Identity". *Contemporary Scottish Women Writers*. Eds. Aileen Christianson & Alison Lumsden.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0, p. 87.

^②King, Jeanette. "A Woman's a Man, For A' That: Jackie Kay's Trumpet". *Scottish Studies Review*, 2001 (1): 106-107.

一性。因此个体的生平叙事能够将情景记忆和未来目标进行整合,从而在当前的时空中创造出有关身份的连贯的叙述。个体通过叙事认同的方式向他者传达“我是谁和我将会是谁”等信息^①。麦克亚当斯(Dan P. McAdams)同时也提出,生平叙事并非仅是过去的再现,而是具有定义的性质,他的观点将学界的目光引向传记研究^②,而《小号》就是杰琪·凯对传记身份的文学注释。

穆迪的身份问题是众多参与者关注的焦点,参与到穆迪人生和身份重构的除去他的朋友和家人以外还有一位名叫索菲·斯通斯(Sophie Stones)的记者,她决心写出一部音乐家穆迪的耸人听闻的传记来揭露他的性别隐私,从而实现商业目的。她在写作的过程中无意重现穆迪的声音和人生,而是着眼寻找他生活中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来吸引冷漠却猎奇的读者,而传记读者对公众人物的私密形象更加感兴趣。同时,传记写作的传统也是更加关注私人和家庭层面的事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认为,传记家的职责就是要忽略那些看似宏伟实则庸俗而空洞的表演和事件,而“将思考转移到家庭和私人层面,展现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约翰逊试图证明传记关注家庭维度的合理性,他相信私生活中的伦理事例是习得道德戒律的最有效和最可靠手段”^③。传统的传记家通过关注传主的私生活来展现他的性格特点和道德风貌,而斯通斯则是通过关注穆迪的隐私来揭露他变态堕落的人生。她费尽心机地搜罗穆迪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具体包括穆迪作为女孩的童年生活、他作为男性的起居习惯、他的居所的详尽描述,以及他女扮男装以前的生活的揭秘解惑。同时她还搜集很多客观的资料来证实她写作视角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例如学校成绩单、获奖证书、照片甚至是私人信件。她决心“跟踪追捕他,我要追溯到他在格林诺克(Greenock)作为女孩子的生活,追溯到他作为约瑟芬·摩尔时的生活。乔西(Josey)——约瑟

(Jose)——乔斯(Joss)。但是他从哪里得来穆迪的名字?或者只是因为忧郁的蓝调(Moody blues)?我要写他的传记,我要讲他的故事,我要成为他的犹太”^④。按照约翰逊的思维方式,自我并非蕴涵在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中,而是显现在社会角色的外表剥落后所显露的始终如一的品格中,或者说外部特殊性和内部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自我成为普遍当中的独一无二^⑤。斯通斯为穆迪做传的的确确是要透过他公众形象的外在而揭露他内在的荒唐无度,她眼中穆迪的独一无二则体现在他的异装癖和性变态。斯通斯执拗于写出一部畅销书的狂热,因此对穆迪有关其人生的自我阐释视而不见,甚至还有意曲解从而达到保证销售的目的。

斯通斯在不择手段地搜集穆迪的生平隐私以外还试图诱导他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披露他鲜为人知的隐私,而穆迪的养子科尔曼就是她诱惑的目标。她对科尔曼(Colman)访谈的目的就是要瓦解他与穆迪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颠覆他的伦理观念,从而使他在盛怒之下讲出穆迪荒诞不经的隐私来吸引读者。斯通斯在收齐有关穆迪生平的信息后也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加工和篡改,在小说有关穆迪的传记的介绍部分,她就模仿科尔曼的声音描述他父亲的可怕和残暴。“当我10周前赶到陈放我父亲尸体的伦敦北部殡葬厅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父亲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如果我仅仅说我对这感到震惊,这语言显然不够强烈。……我简直无法相信,但是我却必须相信。女人身体的部分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⑥。斯通斯对这种诱骗和篡改习以为常,并且对此辩解说,“他说谎是吧?他的人生就他妈是一个谎言。那么即使科尔曼把事情改变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也会为此得到回报”^⑦。因此在斯通斯的传记叙事中,生平的真实性更加取决于叙述的通畅连贯,而非传主的真实感悟和伦理观念。

由前述可见,传记家斯通斯采用搜集整理隐

①McAdams, Dan P. & Kate C. McLean. "Narrative Ident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3): p. 233.

②Bamberg, Michael.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and identity". *Theory & Psychology*, 2011 (1): p. 13.

③McKeon, Michael. "Biography, Fi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Writing Lives: Biography and Textuality,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s. Kevin Sharpe & Steven N. Zwick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39-40.

④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p. 61-2.

⑤McKeon, Michael. "Biography, Fi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Writing Lives: Biography and Textuality,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s. Kevin Sharpe & Steven N. Zwick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42.

⑥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p. 265-6.

⑦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123.

私素材和诱导式采访的方式写就穆迪的传记,也从叙事认同的角度将穆迪的身份定义为腐化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身份构建体现出,传记并非单纯对其叙述主体进行描述,而是对其进行定位,“社会文化的规约似乎总是或者已经将传主进行定位”^①。生平和叙事之间的紧密连接为叙事认同和传记叙事的研究提供广阔的视角,但是这种生命的追溯和回顾的方式也倾向于“重视反思中的人生而轻视生活中的人生”^②。萨特韦尔(Crispin Sartwell)也就此提出疑问,传记中的生命是否真实具有传记家所赋予的目的和意义,传记叙事是否具有传记家所认定的连贯性和目的性^③。萨特韦尔认为传记作为叙事认同方式的最主要问题在于,生命中那些被感知和被经历的关键时刻只能通过与其他时刻相联系而获得意义和价值,所有的时刻只能叠加起来按照时间顺序组成有意义的情节。萨特韦尔认为,以这种方式构想的叙事非但无法赋予传主以生命的意义,还会阻碍传主从此时此地的生活中获得愉悦和快乐。传记叙事作为规范化的机器最终将会击垮传主^④。萨特韦尔对传记作为叙事认同方式的担忧和顾虑主要来自传记家对写作素材的筛选和曲解,同时还因为传记写作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范式无法还原传主真实的生活经历。而《小号》中斯通斯对穆迪传记的处理就并非仅仅是规范化的问题,她受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将穆迪妖魔化,从而构建出他性变态者的身份。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穆迪生平的重新解读成为畅销书需要满足的首要条件是,这部传记要成为倍受责难的行为的典型。因此她在开始传记叙事的时候就兀自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从特权的视角审视和指点穆迪的人生。正如朱迪思·哈尔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所说,“如果分析的对象是离心的主体,那么这项传记工程总会在开始的时候赋予传记家道德特权,传记家首先必须说服自己她的生活是正常的、诚

实的和无可挑剔的,然后才能讲述那些异装癖者和变性人的故事”^⑤。斯通斯将自嘲的正常和诚实的人生与穆迪的荒诞和虚伪的经历相比对的行为再次证明萨特韦尔等研究者的担忧,生平经历和生平再现之间的联系总是很脆弱,并且只能依靠传记家的参与。也就是说,传主的存在有时竟然完全处在传记家的操纵之中。

(二)穆迪传记身份的伦理问题

索菲·斯通斯采用叙事认同策略构建出穆迪的身份,从而实现商业价值的行为是隐含伦理问题的,这种伦理问题首先体现在她违背了真实呈现的原则和传记家对传主的责任。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的第二重含义为表现的伦理(representational ethics),涉及将生平转化为故事的过程,意指现实人物和书中角色之间细微却重要的差别以及自我呈现和自我为他者所呈现时存在的得失和风险^⑥。传记作为经历、记忆和事实的融合,其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很难泾渭分明,霍姆斯(Richard Holmes)认为,“传记家将自己的作品基于那些本质上不可靠的原始资料。记忆本身是充满谬误的,回忆录无可避免地充满偏见,书信则是倾向于它的阅读者……传记家总是要从这些虚构的和重新创作的材料中构建或者编排出貌似真实的模式”^⑦。虽然传记的真实是具有构建性和主观性的,但是“生平叙事从伦理角度来说应该坚持非虚构性和历史事实性”^⑧。因此斯通斯作为传记家一方面需要满足读者有关可读性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对传主负有责任,这就是传记书写中涉及的伦理问题”^⑨。另外,叙事的行为同时也构成斯通斯“作为主体面向他者的伦理性言说(Saying),而言说则强调语言与伦理的关系,是自我向他者履责的本质方式”^⑩。然而她却无视自己对穆迪的责任,而是利用他生平的新闻效应和读者们对传记性作品真实性约定俗成的信赖来突

① Bamberg, Michael.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and identity”. *Theory & Psychology*, 2011 (1): p. 10.

② Bamberg, Michael.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and identity”. *Theory & Psychology*, 2011 (1): p. 14.

③ 转引自 Bamberg, Michael. “Who am I? Narration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elfand identity”. *Theory & Psychology*, 2011 (1): p. 14.

④ Sartwell, C. *End of story: Toward an annihilation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p. 14.

⑤ Halberstam, Judith. “Telling Tales: Brandom Teena, Billy Tipton, and Transgender Biography”. *A/B: Auto/Biography Studies*, summer 2000 (15): p. 73.

⑥ Newton, Adam Zachary. *Narrative Eth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

⑦ Holmes, Richard. “Biography: Inventing the Truth”. *The Art of Literary Biography*. Ed. John Batchelo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17.

⑧ Wiesenthal, Christine. “Ethics and the Biographical Artifact: Doing Biography in the Academy Today”. *ESC*, 2006 (2-3): p. 64.

⑨ Bank, Leslie J. “Untangling the Lion’s Tale: Violent Masculinity and the Ethics of Biography in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Apartheid-Era Policeman Donald Card”.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013 (1): p. 8.

⑩ 陈博:《论〈终结的感觉〉中的记忆叙事伦理》,《当代外国文学》2018年第1期。

破伦理底线,同时诱导读者对故事中穆迪被压抑的性欲倒错产生认同来掩盖她叙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其次,斯通斯的虚假传记所产生的暴力后果给穆迪的家人带来诸多困扰,同时也引发传记写作的伦理危机。伦理概念在范畴上的模糊性让米德尔布鲁克(Wood Middlebrook)觉得,“无法对传记家的伦理行为提出很高的要求”^①。这番评说的起因是她所著的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的传记所引发的争端,她在传记中使用塞克斯顿心理治疗期间的录音和其他的私密材料,她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原本没想将其公之于众。她为自己辩解说:

死去的人无法拥有愿望,他们只有遗嘱,而遗嘱将会委托做决定的权力和责任。……我发现,利益相关各方都声称自己知晓死去的人的想法,并以此作为利己的策略。因此塞克斯顿对我使用何种素材——包括治疗的录音——可能的态度在我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死去的人无法像活着的人那样被要求结合语境而做出判断。虽然无法和死去的人协商,他们也无法像活着的人那样因为自己经历的事情遭到披露而感到羞耻或者受到伤害^②。

就这种观点而言,死者的意愿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秘密被揭露而受到任何影响,但是《小号》中杰琪·凯却突出强调传记叙事对那些被暴露在公众视线中的活着的人们的重要性,穆迪的家人正因为斯通斯的传记而遭受巨大的困扰。他的妻儿并非仅仅因为穆迪的自私行为而受到伤害,斯通斯即将出版的传记也让他们陷入恐惧。穆迪的妻子米莉感觉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我的生活现在就是一部小说,一本打开的书。我深陷于书页当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的生活就是任人攫取的”^③。她的现实因为丈夫的死亡而分崩离析,而现在她被迫参与重构的生活是她自己都无法识别和认同的。也就是说,她

迫于斯通斯的意愿而要将自己从未参与的生平叙述合法化。

这完全是个阴谋,我需要一遍一遍地重复阅读她恶毒的语句来说服自己,这是真实的。乔斯活着的时候,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它是真实的。我们只是继续生活下去。自从他死后,所有事情都停止了,现实也停止了。“你会合作吗?”这对我来说是如此奇怪的想法:我要和一本有关我的生活的书合作,我要将自己移植到他们认为我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中^④。

米莉痛苦而惶恐的状态能够反映出斯通斯的传记所引发的伦理危机,因为有的时候“讲述故事和揭露秘密的传记也是暴力行为,传记应该遵守伦理规范”^⑤。斯通斯有悖伦理的传记书写必定会遭到质疑和反抗,而首当其冲的反抗者就是未曾出现在故事中的乔斯·穆迪。穆迪终其一生在社会规约中挣扎,反抗那些试图将他的身份固定在公序良俗范围之内的势力,因此他无法容忍自我身份的决定权旁落他人之手,并且这些麻木的人无法与他产生共鸣和移情。而他对抗这种虚假的叙事认同的手段则是他所钟爱的爵士乐以及他与养子科尔曼之间的传承。

二 穆迪的爵士乐身份

(一) 穆迪的爵士乐身份

爵士乐特有的即兴、杂合和流动的特点完全吻合穆迪对身份的要求,他首先借助爵士乐和小号的手段来跨越性别的障碍。自 20 世纪末期爵士乐被很多后现代评论家化用来表现多元文化和多种传统相互杂合的身份构建。西蒙·弗里思(Simon Frith)曾经主张以音乐作为隐喻来暗指身份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性为主体带来的自由,“身份是易变的,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件事情,一种化成而非一种存在。……我们的音乐经历——制作音乐和聆听音乐——可以诠释为‘自我处在过程当中’的经历。音乐和身份都既是表演,又是故事,描述个体中的社会因素,社会中的个体因

^①Middlebrook, Diane Wood. “Telling Secrets”. *The Seductions of Biography*. Ed. Mary Rhiel & David Suchoff.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p. 124.

^②Middlebrook, Diane Wood. “Telling Secrets”. *The Seductions of Biography*. Ed. Mary Rhiel & David Suchoff.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p. 127.

^③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154.

^④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153.

^⑤Halberstam, Judith. *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 Transgender Bodies,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New York UP, 2005, p. 61.

素,身体中的灵魂和灵魂中的身体”^①。弗里思的观点非但说明音乐可以成为流动身份的隐喻,同时也指出身体之于身份构建的意义。身体作为社会因素的承载者在身份构建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中将身体的再现形式区分为真实的和文字的,以对应作为构建的现实的身体和身体的意识形态解读。“身体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它能够限制它所引发的想象的意义,但是它也无法避免地成为想象的构建。想象的身体无法通过与真实的身体相比较而被理解,它只能通过与其他的文化想象构建相比较而被解释,那种既存在于文字表述,又存在于现实的文化想象。”^②如果身体只是一种想象或者一个构建,并且无法通过与物质身体的比较而被解读,那么身体的性别差异就会被忽略。而乔斯的跨性别现象则可以理解为多元化自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他女扮男装的行为并非是性别的僭越,而是流动身份的象征。同时,穆迪所弹奏的小号本身就暗示着性别的非确定性,也由此成为自由的象征。托马斯·蒙特雷(Tomás Monterrey)曾经谈道:“这种乐器因为它含混而矛盾的形状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小号的末端是凹陷的,因此也在形状中融合进男性和女性两种特质,就像乔斯的外貌。乔斯虽然身为女性,但是却没有人会否认他是男人。”^③由此,故事中的穆迪通过小号这种乐器而被模糊掉性别的差异。他的女性身体不再成为他构建流动身份的阻碍,进而他将通过爵士乐这种杂合而流动身份的隐喻构建起自己的身份。

杂合流动的身份是穆迪借以摆脱桎梏和获得自由的方式,他在故事中也随着音乐的律动而剥落身上的文化和社会烙印,展示出面具之后隐藏的身份的绝对不确定性。《小号》的文本结构仿照爵士乐的韵律,并以此为隐喻来暗示个体重新定义其血缘谱系,进而构建杂合身份的选择。作者利用文本的碎片化结构从不同的声音和视角探究小说的主要冲突,杰琪·凯在玛雅·雅基(Maya Jaggi)的采访中对此做出评价说,“《小号》的形式呼应着爵士乐。有独奏,且伴随着即兴创

作。……一个副歌以不同的形式演奏。爵士乐令人迷醉,因为它是流动的,它也包含着过去——劳动之歌、奴隶之歌和蓝调。爵士乐就是自我重新创造的过程。在爵士乐中种族也是少些固化,多些流动。爵士乐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家庭”^④。爵士乐所象征的流动和混杂使得杰琪·凯将其视为穆迪身份构建的隐喻,她曾经说,“身份是如何流动,人们是如何重新创造自我,我们是如何将性别和种族归为固定的范畴从而保存我们的偏见,那些所谓的非同寻常的人如何去过平凡的生活,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⑤。由此在小说题为《音乐》的章节中,全知全能的叙述声音贯穿文本,通过模仿爵士乐即兴创作中的摇摆和动荡来定义穆迪的存在,而穆迪的身份也演变成为一个反复而易变的符号。爵士乐中融合着各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因素,由此成为自由的象征。穆迪在身份构建的过程中也最终能够摆脱肉体的束缚,解构所有本质化的描述,获得重新定义身份的可能性。

他的自我土崩瓦解——他的特质、性格、自我意识、性别、甚至最后他的记忆。所有的这些纷纷剥落,就像一层一层褪掉的皮。他用小号将自己一层一层展开。在最底层,直面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的事实。他越是无足轻重就越能够吹响小号。吹小号并非意味着他是颇有来头的重要人物,反而意味着毫无根基的无名小卒。

所有包裹他身体的附着物都伴随着音乐的韵律和他的情感起伏而逐一剥落,期望中的本质却变得更加遥远。他无数张面具后面并没有隐藏着真实,而是隐藏着可以做出各种解释的绝对不确定性。在他漫长的生命旅程中,穆迪的身体也曾经被烙上性别和出身的印记,他首先通过服装掩饰的方式挑战这些文化规约,他的身体也由此部分逃脱文化规范的解读。他获取男性身份的事实意味着他对传统性别定义和界限的挑战。然而,“社会决定着我们在具体的文化中依靠过往的经历创造意义和建构秩序。我们无法避免再现,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再现过程中观念的固化,避

①Frith, Simon. "Music and Ident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s. Stuart Hall &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1996, p. 109.

②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New York 1990, p. 71.

③Monterrey, Tomás. "A Scottish Metamorphosis: Jackie Kay's Trumpet".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November 2000 (41): 172.

④Jaggi, Maya. "Jackie Kay in Conversation with Maya Jaggi About Her First Novel, *Trumpet*". *Wasafiri*, 1999 (2): 54.

⑤Jaggi, Maya. "Jackie Kay in Conversation with Maya Jaggi About Her First Novel, *Trumpet*". *Wasafiri*, 1999 (2): 55-56.

免再现的滥用,或者尽量做到跨历史和跨文化”^①。穆迪想要完全逃避特定文化中的规约和准则是无法实现的,他费尽心机而求得的男性身份也仅是特定文化规约中的男性身份。他也由此感觉自己深陷其中烦琐的过程,并且担心女扮男装的秘密终究一日会被识破。最终音乐成为他唯一的自由源泉,帮助他摆脱矛盾和冲突,他也在音乐的旋律中想象着自己身份的无尽变化和无限可能。他在沦为一无所有的境地的同时也抛弃掉社会规约借以选择和判断他的标签,此时的他能够消除掉长久郁积于心的焦虑,为自己求得无限可能的化成身份。

(二)穆迪爵士乐身份的传承

穆迪以爵士乐为蓝本而构建的流动化成身份人对己都是意义非凡的,特别是对他的养子科尔曼,科尔曼一度因为穆迪真实面目的暴露而产生严重的身份危机。杰琪·凯也评价说,“相对于乔斯生平的本身,我对乔斯周围的人对他生平的回应更加感兴趣,一段人生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②。穆迪的身份对于他的养子科尔曼格外重要,他在接受斯通斯以传记方式构建的穆迪的叙事身份后也经历着严重的身份危机。他所处家庭中有违人伦的事件严重影响到他的个性化身份,他的真实感也荡然无存。与现实达成和解绝非易事,其过程对这位年轻人来说是痛苦而漫长的。他完全丧失掉对生命的诠释能力,甚至“无法判断自己究竟是好看还是丑陋无比。镜子里面有两个科尔曼·穆迪:过去那个戴着眼镜的男孩和现在这个男人”^③。虽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但是这种支离破碎的身份实则是在帮助他理解他父亲的奋斗和努力。他以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方式来理解这位冒牌父亲的身份构建过程。

穆迪身份构建的成功并非仅体现在他爵士乐式身份的确立,更体现在他的养子科尔曼对这种流动化成身份的接受和传承。穆迪的女性身体成为科尔曼最大的困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父子情谊的割裂和家族谱系的断裂,科尔曼无法从家庭中汲取身份构建的支撑。所幸穆迪在故事中给科尔曼留下一封信,以此告诉他生命的意义和身份的含义。穆迪也努力教会他如何根据自己所

希望的现在和未来而操控和掌握过去,如何以想象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家族谱系和身份。穆迪讲述的故事成为科尔曼可以求助和依靠的多重身份文本,后者也由此获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

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他和我在很关键的方面紧密关联着。……他说,科尔曼你可以创造自己的血统。创造出来,然后追溯到过去。设计出你的家谱——你到底是怎么了?你难道没有想象力吗?……科尔曼你看,我可以给你讲我父亲的故事。我可以这样说,他在20世纪初的一天从船上走下来,就说是一个冬日。在寒冬的一天从遥远的黑色大陆跋涉而来,船停靠在格林诺克。……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美国黑人,因为种族隔离问题离开美国,千里迢迢来到苏格兰并且遇到我的母亲。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士兵或者一个水手,被部队或者海军派遣到此。或者我可以这样说我的父亲来自加勒比的一个海岛,岛屿的名字我无从知晓,因为我的母亲没有记住,或者根本没想问。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真实的,科尔曼^④。

穆迪给科尔曼留下的书信意味着他也将自己生命的拥有权交给他,“这很简单,这些都是我的过去,这些是你的部分,你是我的未来。我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你的儿子。你将会成为我的父亲,决定是否讲述我的故事”^⑤。这时候科尔曼成为穆迪隐喻意义上的父亲和穆迪家族想象的谱系的继承者,家族谱系需要他将记忆和想象加以整合从而得以再现和传承。穆迪在信的最后也谈到家庭谱系对身份构建的积极作用,然而穆迪的家族谱系却是以收养为基础,以情感为纽带。

多年前想到你将要经历的种种就会让我有大病一场的感觉。你会理解,或者误解。你会拥有我,或者失去我。你会恨我,或者爱我。你会改变我,或者珍视我。你在以后的多年中会选择其一,或者两者兼有。但是我将会走远,将会

①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54.

②Jaggi, Maya. “Jackie Kay in Conversation with Maya Jaggi About Her First Novel, *Trumpet*”. *Wasafiri*, 1999 (2): 53.

③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181.

④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p. 58-59.

⑤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227.

离开。……你还记得坐在我肩膀上的情景吗?记得坐在我的肩膀上,记得玩我的小号。你记得和安格斯在那艘旧船上钓鱼的事情吗?我当时真傻:记住你喜欢的事情吧。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我的父亲确实是从一艘船上下来的^①。

有关科尔曼血统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他的祖父在假想的过去乘船来到苏格兰,他和他的后代需要以这种模糊的信息作为构建自己身份的语境。作为这种灵活多变的遗产的继承者,他们身份构建的范围会更加广阔。穆迪希望科尔曼能够明白这种抽象化和本质化过程中隐含的自由和可能性,从而能够逃避霸权语篇的限制。同时祖辈、父辈和孙辈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会成为身份构建的有力支撑,以弥补他们之间血缘关系的缺失。故事的最后部分也暗示出,科尔曼最终能够与穆迪家族收养和想象的谱系达成谅解。他在读完穆迪信里的故事后最终能够与他的家庭和他的妈妈达成谅解,“她刚拐过弯,就在渔船停靠在水面处看到他。他正向她走来,他走路的姿势是那么像他的爸爸”^②。这种接受意味着他最终能够摆脱斯通斯传记的影响而接受穆迪作为他父亲的身份,这既是斯通斯所构建的叙事认同的失败,也是穆迪

爵士乐身份和家族谱系构建的成功。

结语

《小号》这部作品可以视为作者杰琪·凯对身份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故事中塑造出穆迪这个充满矛盾和离经叛道的人物——一位多种族、跨性别的流亡音乐家。穆迪作为出色的公众人物倍受崇拜,同时也因为私生活的曝光而遭到鄙夷,两者之间的对比被传记家斯通斯加以利用,并且通过叙事认同的方式将穆迪界定为放荡堕落的性变态者。斯通斯的出现象征着社会规约为那些超凡脱俗的人生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同时也在抨击“20世纪媒介文化的猖獗和泛滥”^③,及其因为利益关系而毫无节制地篡改和操纵他人人生的恶行。斯通斯的设计以失败告终,这象征着她无法将规范性的定义强加在音乐家的生命中,因为穆迪利用他能够掌控的乐器谱写出他的人生篇章,赋予他人生特有的含义。爵士乐的隐喻对理解《小号》无可或缺。就像爵士乐演奏需要多种乐器的相互混合和多种节奏的相互交融,生平的叙述也是如此。生平叙述就是所追忆的生活和参与其中的诸多生活之间相互联系的最终结果,身份因此也是流动的过程和集合的结果。

The Narrative Identity and Jazz Identity in *Trumpet*

WANG Hui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116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novel *Trumpet* by Jackie K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hero of the novel Joss Moody is a multi-racial and cross-gender Jazz musician. His female body and male identity ar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attention. Driven by commercial interest, his biographer Jones constructs his narrative identity as a degenerate and corrupt sexual pervert. This identity construction violates the ethical stand of a biographer and causes great confusion in the Moody family. Fortunately Moody employs the metaphor of the hybrid Jazz music and constructs a fluid and becoming self-identity as an antidote. He then passes down this wa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o his son Colman by way of the adoptive and emotional genealogy. Therefore, the novel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author's attempt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utside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codes.

Key words: Jackie Kay; *Trumpet*; narrative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277.

^②Kay, Jackie. *Trumpet*. London: Picador, 1998, p. 278.

^③Clanfield, Peter. "What Is in My Blood?: Contemporary Black Scottishness and the Work of Jackie Kay". *Literature and Racial Ambiguity*. Eds. Teresa Hubel & Neil Brooks.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2002, p. 16.